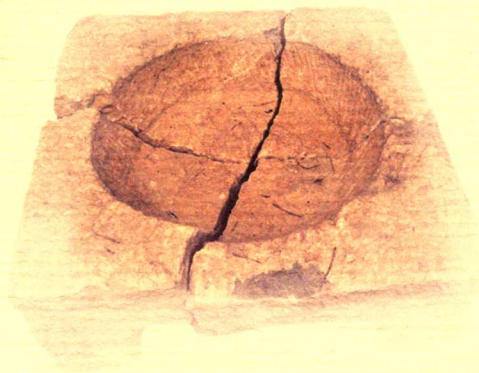


历史人类学典籍研究丛书



# 历代稽勋录 笺正

〔明〕刘继先 / 撰

〔清〕彭肇植 / 传抄

游俊 / 笺正

罗康隆 / 审定

贵州人民出版社

《历代精刻录》是《中华书局影印》系列之一

ISBN 7-309-0471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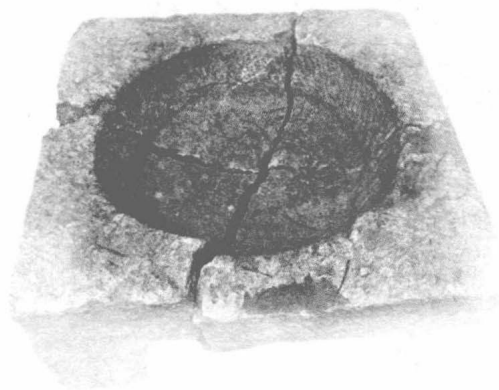
# 历代精刻录

卷五



中华书局影印

历史人类学典籍研究丛书



# 历代稽勋录 笺正

〔明〕刘继先 / 撰

〔清〕彭肇植 / 传抄

游俊 / 笺正

罗康隆 / 审定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代稽勋录》笺正 / (明)刘继先撰; 游俊笺正.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3.12

ISBN 978-7-221-11416-7

I. ①历… II. ①刘… ②游… III. ①土家族-土司-氏族谱  
系-永顺县 IV. ①K8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35471号

《历代稽勋录》笺正

[明]刘继先/撰 游俊/笺正 罗康隆/审订

---

责任编辑/沈晓枫 史开杰

装帧设计/陈红昌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中华北路289号 邮编: 550004)

贵阳经纬印刷厂印刷

2013年12月第1版 2013年12月第1次印刷

开本: 787mm × 1092mm 1 / 16

印张: 26.5 字数: 220千

ISBN 978-7-221-11416-7

定价: 48.00元

此书受贵州出版企业发展专项资金资助

吉首大学  
贵州大学  
贵州师范大学  
凯里学院

联合推出

## 《历史人类学典籍研究丛书》编委会

---

主 编 杨庭硕

副 主 编 罗康隆 张新民 吕幼樵 罗义群

编委成员 龙先琼 暨爱民 瞿州莲 陶渝苏

李红毅 李景寿 石 峰 郑茂刚

## 鸣 谢

---

衷心感谢永顺县档案馆对珍贵典籍《历代稽勋录》的精心保护，以及对我们工作的大力支持。

感谢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的陈春声和刘志伟二位先生，对我们调查工作的慷慨赞助和悉心指导。

感谢参与永顺县田野调查，共同发现《历代稽勋录》珍本，并参与该书校勘、整理、考订的吉首大学师生们，特别是成臻铭教授所做的基础研究工作。正是因为各方的共同努力，本书才得以顺利的完成。

# 从文化人类学到历史人类学 (代总序)

杨庭硕

这套丛书虽然以历史人类学命名,但读者将看到的决不是枯燥无味的纯理论推导,或者仅是吹毛求疵的字词校释,而是几乎可以触摸的文化历史事实再现。在历史人类学看来,历史事件虽然永远不可能重复,但孕育历史事件的文化却从来不允许中断。历史事件不仅专属于古人,也影响着今人。因而,湮没在尘埃中的历史事件,今天的人照样可以真实而全面地认知和理解,也可以和古人一道分享。当然,要完成这样的研究使命,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它需要严谨的学风,缜密的理论推导,更需要韧不拔的毅力和不避艰辛的执著追求。读者在这套丛书中将感受到的,正是我们多年默默无闻探索的成果。相信每一位读者都能从中感受到遥远历史的生动再现。

史学是一切社会科学之母,又是我国学科体系的强项。但要使我国传统的历史学获得新生,肯定需要注入新的血液,赋予新的学术理念。历史人类学正是从这一需要出发,力图做出自己的新贡献。历史人类学绝不否定我国传统史学的功绩和贡献,而仅是希望使传统史学与时俱进,获得新生。历史人类学需要做的事,仅止于丰富和完善世人对历史的理解和认识,以利史学的研究能更好地服务于当代。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史学需要借助文化人类学的理念和方法,需要探索新的研究规范。这是一个从文化人类学到历史人类学的跃迁过程。

文化人类学研究的对象、理论和方法与史学截然不同。然而,文化人类学既然要研究规约人类社会的民族文化,文化就必然是历史积淀的总

成。以至于文化人类学家研究的文化并不是天外飞来的外在社会规范，而是着生于具体民族历史过程中的社会规范积累。就这一点而言，文化人类学研究的文化从来就是有历史的文化，而绝不是聪明人一次性制定的刻板条文。就实质而言，文化人类学家对历史的关注，几乎与文化人类学的诞生同步，只不过不同时代、不同学者对历史的理解各不相同罢了。文化人类学的经典进化论者理解的历史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渐进演化过程。需要声明的仅在于，他们理解的历史是整体的人类文化史，而不是具体民族的历史。将民族历史具体化，开创于鲍亚士时代。鲍亚士学派坚持的历史特殊论，使文化人类学向史学研究大大地靠近了一步。但鲍亚士并没有找到将各民族历史具体化的可靠办法。这不是因为他个人缺乏聪明才智，也不是文化人类学自身的缺陷和偏见。而是因为他研究的民族缺乏最基本的历史文献记载，使他无法做无米之炊。斯图尔德开创了文化生态学，力图从生态背景的差异和文化的适应两个角度，去揭示文化变迁的特殊历史过程；从而使各民族历史的特殊论在所处背景的基础上，向各民族的具体历史又前进了一步。但他同样遇到了研究对象文献史料记载匮乏的难题，以至于他的后继者内亭尽管意识到了社会历史过程对文化形成的不可替代价值，但却仍然无法将各民族的社会历史过程具体化。

中国的情况与西方大不一样。中国传统的治学思想多的是历史感，少的是文化观。以至于蔡元培和刘师培将文化人类学的经典进化论从西方搬过来，去解读中国的远古文献，在当时的中国学术界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但等到人们的情绪冷静下来后立刻发现，中国各民族的历史并不服从统一的进化模型，而是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具体历史，或者说仅属于本民族的特殊历史过程。于是围绕着文化人类学在中国的本土化和与中国史学研究的结合，又展开了新一轮的探索。杨成志将地方志资料引入了对中国各民族的文化研究，力图改变西方人类学片面强调共时态文化实证而导致的浅薄，使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获得了一种历史的厚重感。但这毕竟还不是文化人类学与史学的结合，而仅仅是对文本史料的借用。戴裔煊则致力于文化圈形成过程的历史解答，他看到的仍然是文化演化的共性，而不是各民族文化演替过程的具体化。江应樑坚持文化人类学、历史学和考古学三结合的研究，并为此做出了不少有益的尝试，但却未能提出



三者结合的原则和规范,因而仍然只能视为中国历史人类学的奠基,而不是中国历史人类学本身。

发端于文艺复兴时代的西方学科体系,高举实证主义的大旗,将能不能直接验证作为界定学科性质的唯一依据。从而把法国百科全书学派建构起来的一切学科划分为三大类,即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历史学的研究必须依托于文本史料,而文本史料所提供的资料又无法直接加以验证,因而被排斥在科学研究领域之外,归属于人文学科。随着时间的推移,实证主义思潮的影响日益深入人心,致使历史学的研究对象不能加以直接验证,成了这门学科的致命缺陷。这就使历史学的研究在西方陷入了困境。要为历史学争取到一个正宗的科学定位,就必须奠定它的直接验证基础。汤恩比倡导的比较史学,其目的正在于力争将文本史料纳入可以直接验证的轨范,而这样的努力仍然不能令人满意。于是,在法国萌生了历史人类学。

历史人类学这一学科名称,是由法国的年鉴学派提出的。提出历史人类学的初衷,就是要借助文化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使历史学的研究建立在可验证的基础之上,为历史学的研究赢得科学的正宗地位。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法国的年鉴学派至今已有了三代的学术传统,其代表人物及代表作有马克·布洛赫的《国王的幻术》(1942)、吕西安·费弗尔的《拉伯雷和16世纪的非信仰问题》(1942)、费尔南·布罗代尔的《物质主义与资本主义》、埃马纽尔·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1975)。这些研究传到欧美各国后,又产生了如下一些代表人物,如英国的E·P·汤普森,美国的克利福德·格尔兹和马歇尔·萨林斯等等。并在20世纪后期直接影响到我国的港、台和岭南的学者,产生了一批有影响的研究成果。

从文化人类学到历史人类学的跃迁,必然是一个充满艰辛的探索历程。要将文本史料纳入直接验证的轨范,始终存在着三大障碍。其一是,如何验证史料的真实性。其二是,跨时空域研究的理论基础是什么。其三是,已经丢失的历史信息是否可以重新发掘出来。突破这三重障碍,当然得依托于文化人类学的理论,然而文化人类学的立足点正在于强化共时态的研究,以便使研究的结论可以获得直接的验证。要将适用于共时态研究的理念转而应用于历史上的某一特定时空域,自然成了历史人类学学理建构的核心难题。年鉴学派的三代学人为此做出了艰辛的努力,从不同

的角度，采用了不同的方法，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上述三重障碍，使历史人类学成为一门真正意义上的历史科学。

人类的历史肯定是一个不可复的过程，要获知历史上某一时空域内的历史信息，就不得不借助于传世的文本史料。而传世文本史料提供的历史信息，又因为历史的不可复性而无法加以直接验证。因而，年鉴学派的第一代学人对传世文本史料持怀疑和排斥的态度，企图借助跨学科的综合研究，去丰富和发现可以验证的历史信息。与此同时，还尽力地发掘和利用非官方的文本史料。由于这样的文本史料较少受到不同时代官方政治立场的干扰，因而可信度高于官方文本史料。在这一立论思想的指导下，否定个人在历史进程中的权威作用，而将日常的社会生活史、文化史、经济史纳入了历史研究的视野就势在必行了。他们的这些研究极大地丰富了历史研究的内涵。这一研究传统在第二代和第三代的传人中也得到了遵循，他们的后继者们从不同时代社会文化的整体观出发，形成了一些为学界普遍接受的名著。如埃马纽尔·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和马歇尔·萨林斯的《历史之岛》。前者以宗教裁判所传唤异端嫌疑犯的口供为依据，复原了14世纪法国西南部一个普通村庄的放牧经济、家庭结构、妇女地位等历史面貌。后者则是以英国航海家在太平洋诸岛的航海日志为依据，还原了欧洲人在太平洋探险时代的时空域，并在这样的时空域内试图重现那个时代的族际关系过程。类似的研究由于立足于文化人类学的文化整体观，把流传下来的历史信息纳入历史特定时空域内作文化整体的分析，使不可重现的历史信息获得了间接的验证，从而使历史人类学的研究获得了间接验证的可能。这样的研究思路对我国近年来的历史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非官方文本史料的应用被推上了历史研究的前台。同时，研究者们也出人意料地发现，在这些非官方的史料中照样存在着挥之不去的国家权力影像。在官方史料文本浩如烟海的中国，获得这样的感悟，意味着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历史人类学第一代学人的某些偏见。任何形式的史料文本都会打上不同时代编修者的烙印，但却不会凭空建构历史，而是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建构历史。史料文本通过间接的验证总可以证明其中既包含着可信的历史信息，也包含着编修者的理解和想象。对待不同类型的史料，只能信其可信，去其不可信，而不能单凭史料文本的类型定是非。

历史上的不同文化和社会生活与当代社会处于不同的时空域，因而其社会及文化的整体自然与当代社会截然不同。以致属于历史上特定时空域的社会生活及其文化，显然不能用当代的文化观去加以解读。于是，即使确认了历史信息属于某一特定的历史时空域，要真正弄懂其社会及文化含义，绝对不能用现代人的观念去加以解读，而必须借助那个时代的观念才能获得正确的理解。文化人类学早就提出了文化相对主义，但这一理论仅是提供了史料解读的原则，而不能代替具体的解读。于是，要将文化人类学的结构—功能分析办法应用于对历史事实的解读，就必须做出如下两个方面的努力：一是，要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框定明确的时空域。二是，要明确在选定的时空域内，到底共时并存着哪些历史信息。只有做好了这两项工作，文化人类学的结构—功能分析和文化解释方法才能在历史研究中发挥作用，并使历史研究获得间接验证的可能。为了突破这一难点，布罗代尔将社会文化作了层次的划分。将人物和事件作为第一个层次，这一层次的变化速率最快，具有突发性，因而被他称作短时段的历史。第二个层次为社会文化，如人口的消长、物价的升降、生产的增减等等，这一层次的历史其演化速率慢于人物、事件这一层次的内容，但又快于地理气候、生态环境、社会组织、思想传统的演化速率，因而被他称作中时段历史。他所谓的长时段历史，也即第三个层次的历史，包括地理气候、生态环境、社会组织、思想传统等等，这一层次的历史演化速率最慢。在他看来，短时段的历史只是历史的表面层次，对历史进程的作用十分有限，中时段的历史对历史进程则起到了直接和重要的作用，只有长时段的历史才构成历史的深层结构，构成整个历史发展的基础，对历史进程起着决定性和根本性的作用。做出这一划分的理论依据是文化人类学泰勒时代提出的文化残留理论，其实质在于，揭示了文化要素的演进具有非等速性。在这一理解的基础上，那些长时段的历史内容不仅可以获得间接的验证，甚至还影响着今天的社会，因而有可以进而获得直接验证的可能。

在他的名著《地中海与腓力普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世界》一书中，第一部分描写的是地中海地区10个国家的地理环境，包括山脉、平原、海岸、岛屿、气候、城市、交通等，力图说明地理与历史、空间与时间的辩证关系。这部分内容，其实质就是他所宣称的长时段历史，即一直在影响着今天的那部分历史，因此这部分历史也就获得了直接验证的可能。也正因为

如此，他才更加看重对长时段历史的研究。

该书的第二部分讨论了16世纪地中海地区的社会和经济状况，包括人口、劳动力、货币流通、物价等等。这些内容显然属于特定时空域的产物，今天已经无法加以直接观察和验证。对此，他采用了文化人类学所提出的结构—功能分析方法，力图把16世纪西班牙腓力普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世界作为一个紧密联系的整体加以分析和研究。他的这项研究工作实质上是历史人类学必须面对的一项重大研究使命，即历史信息的解读。这项解读，必须坚持文化相对主义的原则，决不容许以今释古，只能用当时的立场和观点对社会要素之间的关联性去做出说明。就这样，他的这一研究个案，圆满地解决了时空域界定和历史信息解读的难题。

该书的第三部分主要讨论了16世纪地中海地区的政治史、军事史，主要描述土耳其与西班牙两大帝国争霸地中海的过程。他认为这部分历史属于短时段历史，只是历史的表层，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有限。即令是两大帝国争霸直接牵涉的民族，战后改变的也仅仅只是其归属，而实际的社会生活则并不发生质的变化。这一结论，极大地改变了传统史学的习惯性看法，重大的历史事件和英雄人物为之失去了在历史研究中的独尊地位，而普通人的实际社会生活却在历史研究中突现出来。

突破文化人类学与历史学有效结合难关的不仅是布罗代尔，布罗代尔的前辈们也对史料信息的解读作了重要的铺垫。吕西安·费弗尔在《拉伯雷和16世纪的不信仰问题》一书中，事实上是重新解读了16世纪的欧洲宗教史。按照传统的史学观念，在天主教处于至尊地位的时代，只能是一个极端封闭、极不科学，没有任何创造力的黑暗时代。但在该书中却注意到了，传统的史学结论只是在以今释古，而没有触及当时的社会事实。在费弗尔看来，宗教的权威仅是表象，在真实的社会中，不信神的现象仍然普遍存在，社会的进取、个人的创新并没有真正被窒息，而是在为以后的资本主义勃兴作了社会文化的铺垫。费弗尔的这种解读，在布罗代尔的手中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15~18世纪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一书中，他力图证明资本主义的社会文化基础先于资产阶级革命，资产阶级革命前便已在欧洲各地普遍存在。至于资本主义的市场化运作和规范，为何最先出现于意大利的威尼斯，然后才是尼德兰革命，以及日后的英国，这仅仅是由机遇决定的偶然事件，对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并不

会发生根本性的影响。

近年来,年鉴学派的这些工作,对我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王明珂的《羌在藏汉之间》一文,凭借对广泛流传于羌族中的兄弟定居传说的解读,复原了这一传说在权力的拥有和资源分配上所发挥的社会功能,使一个看上去并无深意的民间传说获得了具有文化价值的历史解读。从而使中国无比丰富的传说、礼仪、习惯都获得了不容置疑的历史研究价值。

特定民族的历史其内容极其丰富,无论研究其间的哪一个时空域,官方文本能够提供的历史信息肯定极其有限。凭借有限的历史信息,显然不足以复原历史的全貌。因而,致力于发掘和利用新的历史信息,自然成了历史人类学一个极其重要的研究领域。从马克·布洛赫到埃马纽尔·勒华拉杜里,在否定官方文本史料权威性的同时,都致力于发掘来自社会下层的各种民间文本史料。但即令如此,他们仍然感到历史信息的贫乏。于是,又理所当然地倡导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凭借社会学、经济学,乃至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在文本史料信息之外去发现新的历史信息,同时赋予了不同学科的理论解读。布罗代尔的绝笔之作《法国史》第一卷《法国的特性》就大量地运用了法国出土的考古资料。在他看来,法国的特性在一定程度上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就奠定了基础,这样的特性还一直影响到今天。在这里,他倡导的大尺度、长时段的历史研究得到了充分的贯彻,并因此为其他学科史料信息的发掘和利用奠定了学理依据。其中,通过文化人类学和考古学发掘新的历史信息占据着突出的地位。后继者中倡导口述史的解读,则是在他倡导的学理基础上作了进一步地延伸。

中国的文本史料尽管浩繁而完备,但在贯彻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时,同样感到历史信息不足。发掘非官方的文本史料和非文本史料,在我国近年来的研究中依然能引发强烈的响应。刘志伟通过珠三角村寨空间布局,特别是宗祠空间布局的解读,成功的复原了这些集镇的形成过程,以及围绕其形成而相伴的经济、习俗、社会组织的变迁。这一研究堪称是不动土的考古发掘研究。赵世瑜则凭借早已被人淡忘的宗族记事碑刻,去发掘这些碑刻所处时代的历史信息,成功地复原了不同地区的历史社会生活面貌。这些研究都充分证明,整体的历史虽然不可复,但历史信息却是可以重新发现的,也是可以重新解读的。发现与解读信息,与新考古学的主张不谋而合,都是在发掘中借助于新的技术和方法,提取可靠的并经得起

反复验证的历史信息。

今天，历史人类学在我国正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随着上述三大难题的解决，加上我国有丰富的文本史料储备，历史人类学的长足发展，在我国正当其时，正当其用。为此，我们大力推出这套历史人类学研究丛书，并希望将这项工作一直持续下去，不仅要用历史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重新解读官方文本史料，还要解读非官方的文本史料，甚至是口述史资料，而且还要致力于借助文化人类学、考古学和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不断地发掘历史信息。要在这项工作的基础上，定型一套中国式的历史人类学理论和方法规范，使发端于法国的历史人类学在中国真正实现本土化，成为中国式的历史人类学。让历史的研究成为能直接服务于当代社会的有用工具。由于工程的浩繁和我们的学养欠缺，我们期盼得到社会各界的关怀和支持、批评和斧正，更期望有志的同仁积极参与，使这套丛书更具活力，能够为我国广大读者所认同。

谨此为序！

2007年3月10日于吉首大学梓园村



# 序 一

学界对土家族历史的研究为时已经不短，成果亦已堪称丰硕，但史料来源大多取准于汉文官方典籍，出自土家族编写的史料则极为罕见，甚至能否证实有土家语文本史料的存在，也成了学术界长期争论的重大问题。然而，随着《永顺宣慰司历代稽勋录》“传抄本”的被发现，上述带根本性的争议，立刻有了着落。单凭这一残卷至少可以表明，土家族有自己的文献史料，也有用汉字记录土家语语词编写成的文本史料。这不啻为史学界的一项重大突破，但要准确揭示《历代稽勋录》孤本的具体内容则至艰至难。其原因全在于，这本《历代稽勋录》的原作者刘继先，虽然是用汉字写成该书，但史料来源却是用汉字记录土家语语词写成的《土记》和《土传》，而刘继先本人显然不懂得土家语，整个写作过程只能是请土家族学人替他做翻译，再由他编成定本。而这些土家族文人对汉语也并不熟悉，对历代王朝的年号和历代史实所知更是欠缺，以至于从现存的《历代稽勋录》“传抄本”看，翻译错误的年号名称、人名、地名，等等几乎随处可见。

要逐一将上述讹误加以订正，使发现的这本《历代稽勋录》成为可读、可资征引的著作，对今天的史学工作者而言，显然是一件极大的挑战。能够做好这项工作的人，全国不会达到两位数。关键的困难在于，今天的史学工作者真正能够熟练掌握土家语的人几乎找不到，即使懂得土家语，他也不一定熟悉《历代稽勋录》所载内容。因此，这本书在经历了长达五年的反复整理和研究后，能够与读者见面，实属土家族历史研究的一大盛事。仅仅为了这一点，游俊教授为此付出的辛劳，确实值得大家尊重和感谢。

本书的出版，肯定会极大地改写此前对土家族历史的认识，匡正诸多传闻上的偏颇与失误，但同时也对学界提出了一项严峻的任务，即如何

利用新观点和新方法，去对这本珍贵的《历代稽勋录》，展开全面而系统地研究。从这一意义上看，本书的问世不仅是一项重大的发现，一项艰辛的成果，更是一个新的起点。它将预示着对土家族历史研究的一项新进展和新局面的到来，而且还暗示着与《历代稽勋录》相类似的，甚至是土家语文本的史料，也可能被发现。最终将会使得，学界对土家族历史的认识，不断地接近于历史的真实，而且能够具有真正的土家族的视角和眼光。

正值本书出版之际，我与学术界的同人共同期盼着土家族历史研究这一新局面的到来，并对游俊教授所做的工作表示感谢。

杨庭硕

2013年9月10日



## 序 二

《历代稽勋录》的原作者系明万历年间人刘继先。刘继先编撰该书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报答永顺彭氏土司对自己和祖上的厚恩，而另一方面则是为了赞扬永顺彭氏土司对朝廷的忠、勇、勤业绩，以维护该土司的声望和定位。元、明、清三代是在我国西南地区普遍推行土司制度的时代，类似的著作本来并不少，但能够流传至今的却为数不多。除了政局的动乱、传承技术上的困难外，更关键的原因还在于，像《历代稽勋录》那样的少数民族土司宦谱，要受到地域、民族语言翻译、读者面狭窄等多重障碍，因而很难广泛流传，更难于用规范的汉语文版本在内地广泛流传。吉首大学的师生们在民族田野调查中，有幸发现该书的残卷，实属万幸。

发现的《历代稽勋录》残卷，书名改题做《土司家谱》，但现存抄本中的六成以上内容则是刘继先《历代稽勋录》的手抄卷，其余内容则为请嘉庆时期彭氏土司后裔彭肇植所增补，两者内容相互传承、相互交错，传抄时彭肇植还对原作做了不小地改动。这就使得对《历代稽勋录》原作的整理和初步研究变得极其困难。为了恢复这一珍贵史料的原貌，游俊教授执着地整整工作了五年：一是将刘继先原作从该抄卷中剥离出来，二是将传抄过程中的讹误逐一做了订正，三是对某些关键内容做了全面的考释，四是立足于这本珍贵的史料做了初步的考订和研究。最终使得这本被学术界誉为早已亡佚的珍贵历史典籍重新焕发了新春，对土司制度研究所能作出的贡献，必将光大于学界，施惠于后人。时值此项重大研究成果付梓之际，对该书的价值做一定的提示，也就显得十分必要和及时了。

通过对该书的研究，游俊教授发现，刘继先编撰的这本《历代稽勋录》的主要依据来源于《土记》和《土传》，这两本书是永顺彭氏土司私撰、私传的档案式文书。各种迹象表明这两本书是用汉字记录土家语语词编撰而成，可以视为是土家语文的著述。这当然是一项具有轰动效应的结论，因为在这之前学界虽然有人猜测土家族有自己的文字但却苦无